

中央党校研究室关于林彪最新研究成果



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存疑

中央党校研究室、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党史研究室(以下简称“三室”),自2007年初就林彪、陈伯达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反革命集团案,进行复核。今年3月中旬,以“三室”名义给中央政治局递交了《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,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》的意见报告。

“林彪反革命集团案”不能成立

该报告指: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关系,陈伯达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之间的关系,林彪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之间的关系,从已公开和非公开、防扩散的证据中,林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,无另立组织,无要推倒、颠覆宪法中社会制度,无搞有组织性活动。在个人之间或在聚会时,对当时的路线、政策或党中央主席有意见、有批评(包括激烈的指责),都属于党的组织性、纪律性范围,所以“反革命集团”罪状难有法律依据确立。

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

命集团的关系

该报告指: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,欠缺勾结反革命犯罪事实,而“勾结”活动基本上或称主要目的是维护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、毛泽东思想。林彪和江青所谓勾结,同样是为了保卫毛泽东,捍卫毛泽东发动、领导文化大革命。林彪和江青之间的斗争,有权力斗争,有对文化大革命立场上的分歧,实际上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。该报告指:林彪问题的实质、性质,纯属党内斗争、宗派斗争,也包含着反对毛泽东专制、独裁、政治狂热的正确方面。在特殊年代、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,林彪追随或同意毛泽东的路线、决策,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及行政上渎职。

林彪四次推辞当接班人

该报告指:林彪并无参与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制定文化大革命路线。

林彪在1966年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,曾四次推辞当接班人,包括两次书面报告。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

批示:“考虑甚久,惟有林彪最宜接班,请接受委托”。结果,林彪把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,说了一句:“我不想倒在润之前”。叶群令机要员退下,把报告捞出来,并在一起粘帖上,锁在保险柜内。

该报告指:1958年5月,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,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。宋任穷、陶铸、粟裕、罗瑞卿上门祝贺。林彪并无兴奋,还写了几句,重复二次:“晚年要平安,要避锋芒,要避政治,要避会议,要避聚会,要避润之,要避表态”(摘自宋任穷、罗瑞卿揭发材料)。

该报告中引证了有关揭发材料和有关档案资料,在很大程度上争鸣:林彪有其独立思考、政治判断,而不少判断是正确的,如:要结束文化大革命,要求抓生产,搞建设;要求发展科学,恢复高等教育;要求改善和苏联、东欧的关系,等。

关于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



▲ 1971年5月1日晚,林彪匆匆而来,没有和毛泽东打招呼,拉着枯黄的脸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。这幅“正副统帅”在同一画面的照片,成为当晚活动中的惟一。

该报告中指: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,这属于党内正常生活。事实上提设国家主席,是毛泽东本人。1970年3月9日,毛泽东和周恩来、康生、李德生谈话时说:“党有个主席,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,人选还要议一下。”

该报告中指:1970年3月12日,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,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,信中提出五点看法,“请主席指教: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;全面恢复党组织、政府部门、各机关企业、农村公社、社会秩序;抓战备,发展国民经济;解散一切群众组织,停止内战;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、宽恕处理。”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、康生、江青三人阅,并批上:“阅后,可以坚持个人意见、立场。”

关于批陈伯达整风运动

该报告指:1970年8月29日,毛泽东写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一文,严厉批评陈伯达,送林彪阅,

附上“等候意见”,但林彪没复。31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。

1970年11月18日,林彪对周恩来、康生、纪登奎,就中共中央在11月16日发出《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》,在党内上层展开检举、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:“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、主席的助手也反党,谁还有意见?”

1970年12月20日,毛泽东提议:“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、批示,凡有文件起草或决议案等,直接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”。12月23日,毛泽东又加上:“经周恩来传达至政治局各委员”。

1971年2月,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“批陈整风”运动。

毛泽东不接受林彪请辞

1971年3月22日,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,信中提出请辞,和妻子、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的要求,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,恢复党、政、正、极、社会正常秩序。

4月20日,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给林彪的答复:“请辞不妥,恐会引发党内外混乱,你还是副主席。党章规定的接班人。我(毛泽东)不能接受请辞。养病为重。”

林对毛反感的公开化

1971年4月27日,周恩来传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,出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。林彪以不回答拒绝。5月1日晚,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后,三次和林彪、叶群通话。最后,周恩来对林彪说:“能否看在我周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,即来,否则影响太大、太大。问题我会尽力的。”

林彪晚了23分钟到天安门城楼,又提前半小时离开。整个过程,没和毛泽东打招呼。

资料表明,所谓国家主席之争,是老毛一手炮制的阴谋。

揭秘五虎将歼敌数比较:粟裕胜过林彪

彭德怀、刘伯承、粟裕、林彪、徐向前号称毛泽东的“五虎上将”

抗美援朝,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,同时也是最艰险、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。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,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,加上南朝鲜军及英、法、加、印等国组成的“联合国部队”,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,都是一个新课题。《孙子兵法始计第一》中说:“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早在抗日战争时期,毛泽东也指出:“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,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。”因而,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,为此,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,等了粟裕近三个月,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。

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、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?

显然,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,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,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,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。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,朱德、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,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,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,年龄显然偏大;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,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,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,从陕西进军入四川;罗荣桓、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;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,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(华东野战军)司令员,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:“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”,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。1950年9月,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,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,他对毛泽东

说: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,但只要前线需要,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!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,但他的主动“投笔请缨”始终没有被考虑。如此,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粟裕、徐向前中间选择了。

首先,从兵员数量来看,上述五位将领中,以粟裕、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。解放战争中,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。第一野战军(西北野战军)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,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,1947年8月成立时仅4.5万人,三个月后,部队增加到7.5万人。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,部队为15.5万人。1949年6月,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、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,总兵力才达到34.4万人。

第二野战军司令员(中原野战

军)刘伯承,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,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。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,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,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。1949年2月,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,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。

第三野战军(华东野战军)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、代司令员粟裕,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.5万余人(不含军区部队)。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(不含军区部队)。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,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,战后,野战军达到55.1万人。1949年2月,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,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(不含军区部队)。至1949年12月,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.5万余人(不含军区部队)。

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,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。

第四野战军(东北野战军)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(含军区部队),1947年12月,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、11个炮兵团、1个战车团共42万人。1948年8月,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(不含军区部队)。1950年1月,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(含军区部队)。

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,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(后改称18兵团)后,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(军)作战。1949年3月至4月,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、19、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(3月底,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)。